

预测与国际关系科学*

卢凌宇

内容提要:国际关系学的科学性不在于预测能力,而在于理论猜想的可证伪性。国际关系的可预测性,首先取决于事件的性质,其次才是预测方法。国际关系世界是人的世界的一部分,而人的世界与物理世界是异质的,因此,适用于物理学和工程学的方法无法预测绝大多数的国际关系事件。

关键词:预测 国际关系 科学

引 论

在大多数社会科学知识生产者和消费者看来,预测能力是社会科学最重要的价值。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宣称,社会科学的首要功能是预测。理论的前提不必真实,但必须要演绎出能被证实的猜想。^①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谈到人们学习经济学的动机时曾指出:“人家对于这门叫做经济学的学问之所以有兴趣,完全是由于想从这里学到一点关于达成明确的目的而采取的方法的知识。学生之所以听经济学教授的课,和政府之所以聘请经济顾问,都是想得到关于将来的消息,而不是想知道过去。”^②这个观点完全适用于国际关系学。在广袤的国际关系领域,人们通常关心的并不是建构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哪个解释能力更强,或者民主和平论的经验基础是

* 除非特别说明,本文中“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科学”、“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科学”交叉使用,均指政治学中对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科学研究的领域(field)。本文的着眼点是国际关系的“科学性”问题,但并不否认这个学科同时也是一门艺术,请参考王义桅:“在科学与艺术之间:质疑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9期,第4-10页。

① Milton Friedman, “Positiv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p. 3-43.

② [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经济学的最后基础》,夏道平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7页。

否经得起推敲,而是美国何时会衰落、美国由于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而对俄实施的经济制裁会持续多久、金融危机后欧洲一体化的前景、利比亚的政治乱局何时会结束等前瞻性的问题。

预测是如此富有魅力,以致被认定为判断社会科学科学性的标准。有学者认为:“是否有预测力是检验一门学问是否有科学性的重要标准。预测力差说明这个学科的科学性还不强”。^①这个观点在国内颇有市场。其实早在1985年,国内就有学者指出预测能力的强弱关系到社会科学的地位和前途:^②“只有具备预测功能的理论才是成熟的理论,才能从假说阶段进而成为科学”。^③

但本文认为,以预测能力来判断国际关系学或广义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是对科学的误解。这个误解,源于物理和工程学思维在社会研究领域不恰当的应用,是把物理世界与人的世界相互混淆的结果。政治事件的可预测性是不同的。国际关系科学理想的预测对象是那些可预测性高的事件,对那些可预测性低或不可预测的事件则无能为力。

一 国际关系学的预测纪录

在现实中,国际关系预测的效果差强人意。美国的情报部门和学术界未能预测到一系列改变国际格局的大事件,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9·11”袭击、伊拉克大规模武器扩散、印度进行核试爆、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伊朗伊斯兰革命、美国的单极世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冷战后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和平主义,等等。他们承认,这些“让人始料不及的发展……令情报界和学术理论界非常尴尬”。^④学者们也曾预测斯堪的纳维亚式福利国家的消亡和日本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不过这些预言都被历史的发展一一击碎。^⑤布莱斯(Mark Blyth)坦言:“我们把政治世界想象得易于预测,结果是创造了很多在事实面前大跌眼镜的理论”。^⑥

① 阎学通、陆昕:“阎学通:执著于科学预测的现实主义者”,《世界政治与经济》2005年第7期,第57-62页。

② 阎耀军:“社会科学与社会预测”,《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6期,第250-260页。

③ 冯之浚:“预测研究的功能与作用”,《河北学刊》1985年第4期,第13-20页。

④ Richard Herrmann and Jong Kun Choi, “From Prediction to Learning: Opening Experts’ Minds to Unfolding Hist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1, No. 4, 2007, pp.132-156.

⑤ Mark Blyth, “Great Punctuations: Prediction, Randomness, and the Evolution of Comparative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0, No. 4, 2006, pp. 493-498.

⑥ *Ibid.*, p.497.

国际关系预测的领军人物是布宜诺·德·孟斯奎塔(Bueno de Mesquita)。孟氏和他的团队把经济学中的预期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简称EUT)引进国际关系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做了大量的预测。^①孟斯奎塔和门罗(James Morrow)曾表示,他们的模型在美国政府的外交决策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预测准确率高达90%。^②但是,瓦尔特(Stephen Walt)对这个说法表示怀疑。他指出,EUT确实曾预测苏联会在冷战中失败,^③但这项成果是在苏联解体六年后才发表的。孟氏也曾期望巴以和谈的结果最多不过是以色列接受一个半自治的巴基斯坦,^④但是,以色列很快就对巴勒斯坦做了巨大的让步,只是没有允许阿拉伯人独立建国。在谈到EUT的影响时,瓦尔特引述了两位美国前国家情报委员会主任和一位前副主任的观点说,他们并不知道孟氏的模型对政策评估的过程和决策有什么影响。^⑤

国际关系学令人尴尬的预测纪录是整个社会科学预测的缩影。相较之下,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预测纪录要好得多。尽管如此,国际关系学者并不是没有成功的预测。阎学通的国际关系科学预测就有辉煌的战绩,包括成功预测“1997年克林顿政府不同意恢复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国事访问、1998年巴基斯坦必然进行核试验来回应印度、1999年李登辉要把暗独政策变成公开独立政策、2000年国民党下台和陈水扁当选、2004年陈水扁连任、中日关系将长期恶化”。^⑥此外,据已披露的材料,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成功预测了勃列日涅夫死后的政治安排、三次印巴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越战的结局等事件。^⑦

由于国际关系预测并非毫无斩获,而且有时候预测成果似乎还相当可观,因此不少学者对国际关系预测的前景持乐观态度。在这些学者看来,上述成功预测的案例至少表明:“关于自然科学知识可以用来搞预测、而社会科学知识不能用于预测的说法

① See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n Expected Utility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4, 1980, pp. 917-931.

②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nd James Morrow, “Sorting through the Wealth of No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1999, pp. 56-73.

③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Predicting an Emergent Propert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2, No. 2, 1998, pp.131-155.

④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s: A Spatial Analysis of the Arab-Israeli Dispu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4, No. 3, 1990, pp.317-340.

⑤ Stephen Walt, “A Model Disagree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1999, pp. 115-130.

⑥ 阎学通、陆昕:“阎学通:执著于科学预测的现实主义学者”,第59页。

⑦ 任新民:“CIA政治预测得失的组织原因分析”,《预测》1995年第1期,第68-72页。

是一种误解”。^①因此,波普尔断言社会科学“只有在事后追溯”,^②是言过其实了。

应当承认,“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的区别在于前者的预测力强而后的预测力弱”。^③但是,对于国际政治科学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可能并不是它的预测能力有多弱,而是为什么会那么弱。如果弱的原因是方法,那么改进预测方法必将提高预测的正确率。但如果弱的原因不是方法而是国际关系现象的不可预测性,那么以预测能力的强弱来判断国际关系的科学性就是不恰当的。

二 物理世界与人的世界

科学预测依赖于理论假定。冯之浚指出,科学预测的一个假定就是“惯性原则”,即“过去一种事物随时间而变化的样式,即为现在以及今后该事物随时间而变化的样式”。^④这在时间序列分析中被称为时序的随机平衡性。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则指出,社会科学预测的本质是历史决定论。历史决定论者有意无意地坚信人类的状况亘古不变,历史提供了永久先例的价值,未来的人只需按照天意的设计来生活即可。^⑤国际关系预测专家并不是历史决定论者,但他们至少相信“过去传达了关于事务必然经历的未来路线的信息”。用政治学的术语来说,就是预测的前提是政治在本质上是模式化的,并且这些模式会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下去。政治学的功能就是发现这些模式。^⑥

无论“惯性原则”还是政治的“模式化”,传达的信息都是世界政治是相对稳定的,即政治行为呈现正态概率分布,是可追踪的(trackable)。^⑦然而,这样的高度稳定性只在物理世界才存在。人的世界与物理世界有着本质的不同。物理世界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决定事物间关系的条件是稳定的,例如地球与太阳的距离是由引力决定的。二是事物对条件作用的反应是稳定的,比如弹簧对压力的反弹。由于这两个特点,物

① 李小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规范化的期待:评阎学通等著《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8期,第78-80页。

② [英]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邱仁宗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③ 李小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规范化的期待:评阎学通等著《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第78-80页。

④ 冯之浚:“预测研究的功能与作用”,第17-18页。

⑤ [美]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150页。

⑥ Samuel Barkin, “Realism, Prediction, and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5, No. 3, 2009, pp. 243-246.

⑦ Mark Blyth, “Great Punctuations: Prediction, Randomness, and the Evolution of Comparative Political Science”, p.493.

理关系有着很高的稳定性,因此物理学的预测性也是极强的。^①

物理世界的这两个基本特点在人的世界并不存在。人类行为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和易变性。这种不确定性基于三个相互关联的原因:第一,人的行为是有限理性的(bounded rationality)。以物理学为模板的理性选择学派假定人是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但西蒙(Herbert Simon)等人的研究反复表明,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很多时候甚至是非理性的。^②卡普兰(Brian Kaplan)的经验研究充分说明,主宰美国人政治观的不是理性而是偏见。美国选民在对外经济关系、职业发展、市场管制和宏观经济政策等领域,都表现出强烈的非理性和盲从性。^③尽管人类工具理性稳定并强大,但其发挥却受到信息量、认知能力、个人情感和时间限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阿隆(Raymon Aaron)发现,人类行为虽然受到教育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但却是一系列不确定事件的结果。这些事件往往根源于人的主动性。军事首领、政治家、投机分子和企业家被公认为人类社会最理性的个体,但即便是他们,对局势也缺乏足够的了解,因此“在行动时就像在下注,而且只能是下注”。^④

第二,人具有反思能力(reflexivity)。物理世界非常稳定,人类的预测无法改变物理规律,物理现象有自己的运行路径,不受人的预期和愿望的影响。^⑤然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包括有思维的人,由人的思维活动所引发的问题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没有对应者。在量子力学中,虽然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断定了科学观测的某种不确定性,^⑥但这种干扰是外生的(external)。但在社会事件中,构成不确定要素的是人本身。鉴于此,社会研究的内容不局限于事实,还包括人对事实的认知。如果说物理科学是从事事实到事实,那么社会科学则是从事实到认知,再从认知到事实,而且在事实与认知间不存在等价关系。^⑦意义、价值和目的这样的概念在自然科学中没有意义,但由于人的意识的介入,它们成为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米塞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把研究老鼠或生铁状况的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对人的行为的描述,是一种无理由

① 高小勇、谢作诗:“关于数学‘帝国主义’的通信”,《经济学消息报》2003年12月12日。

② Herbert Simon,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9, No. 2, 1982, pp. 293-304.

③ [美]布莱恩·卡普兰:《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刘艳红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

④ [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航、顾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174页。

⑤ [美]米塞斯:《经济学的最后基础》,第94-97页。

⑥ 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在1927年提出,在量子力学中,由于测量这种动作不可避免地干扰被测量粒子的运动状态,因此,粒子的位置与动量不可能同时被确定。

⑦ [美]乔治·索罗斯:《金融炼金术》,孙忠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的游戏”。^①

第三个原因是前一个原因的结果,即社会科学中主客体之间存在因应或交互效应,^②结果是社会预测反过来影响社会行为。在交互作用的影响下,主客体的分界是相互“缠绕”的:一方面,一个事件本来会发生,但预测阻止了该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一个事件本来不会发生,但预测刺激了事件的发生,这就是建构主义者所谓的“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此外,预测也会使事件发生量的变化。^③因此,我们很难判断某个预测是成功还是失败。波普尔(Karl Popper)曾经举过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如果我们预测某支股票在几天后升值,而该股票的价值几天后真的飙升了,这不必然证明我们的预测成功。原因在于:某个信息来源尤其是大众瞩目的信息来源刊发这个预期时会对市场产生较大的积极刺激作用,股民会认同这个积极暗示,买入更多的该股票,从而导致股价上涨。也就是说,预测者的认知对预测产生了正反馈。我们无法确认,不是这个正反馈,而是市场结构、经济形势、公司业绩等因素导致了股票上涨。也就是说,有可能不是我们的预测正确,而是预测变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④类似地,我们有理由推断,这样的情形在国际关系预测中虽然难以查证,但肯定存在。比如美国、中国等大国的权威智库所做的预测,一经公布,不仅制造了世界级舆论,还被认为多少代表了该国政府对具体事件的态度或政策倾向。虽然其影响的大小难以笼统地估量,但不至于没有社会和政治效果。

三 政治的三个世界

物理世界不同于人的世界,政治世界则是人的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不确定性也是政治世界的特点。不确定性是未来事态发展的状态。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是人的认知能力、信息水平和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布莱斯指出,政治世界的不确定性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因此政治事件并非完全同质。按照不确定性的不同,可以将政治事件分为三个世界。^⑤

① [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经济学的最后基础》,第61-62页。

② [美]罗伯特·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7页。

③ 参见李明华:“论社会认识的特殊性及社会预测的复杂性”,《哲学研究》1994年第3期,第11-16页。

④ [英]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124-126页。

⑤ Mark Blyth, “Great Punctuations: Prediction, Randomness, and the Evolution of Comparative Political Science”, pp.493-498. 对三种统计分布的技术细节感兴趣的读者,请务必参阅原文。

第一个世界是高斯分布(Gaussian distribution)的世界。高斯分布就是呈钟形的正态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其假定是一个变量的值是许多独立随机因素影响的结果。在这个世界,关于被预测事件的信息很容易获取,研究者对事件历史的数据分布有着明确的认识。由于是正态分布,虽然具体预测的时候会有一些偏差(deviation),但历史数据取样总体上可以较好地映射出未来。在这个世界里,轻易不会发生理论革命,政治事件通常都在界定清晰、运转良好的制度环境里发生,变量往往可以直接观察到,最典型的例子是司法和立法政治。在国际关系中,对成熟民主国家的对外政策和政府间国际组织行为的预测,也大致属于这个范畴。值得注意的是,高斯分布在数学、物理和工程领域的应用非常普遍。

第二个世界呈泊松分布(Poisson distribution)。泊松分布是最常见的离散型概率分布之一,适合描述单位时间/空间内随机事件发生的次数。如果一个随机事件以固定的平均瞬时速率随机且独立地出现,这个事件在单位时间(面积、体积)内出现的次数或个数就近似地服从泊松分布。第二世界的事件有着显而易见的随机性,例如股票市场、大选以及战争等。在这类事件中,人们可以搜集详尽的历史数据,但却观察不到事件的真正决定性变量,它很可能隐藏在已知的因变量之后,所以事件的结果可能没有在数据样本中出现,也可能在事后才逐渐为人所知。200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出奇制胜以及以色列在2006年第二次入侵黎巴嫩,就是这个世界的事件。简言之,第二个世界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预测者虽然对事件有一些自信的期待,但不敢断言未来会怎样。

第三个世界的事件呈现出帕雷托-列维·曼德布洛特分布(Pareto-Levy Mandelbrot distribution)的特点,即事件数据的极度随机性和易变性。研究者即使做再多的抽样也没有用,因为样本分布不提供可供追踪的线索。在很多情况下,即使存在统计样本,也没有办法抽样。这个世界的事件没有均衡点,因此人们对未来的预测几乎总是出错。全球经济走势是第三世界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布莱斯给出的另一个经典案例是关于福利国家起因的探讨。有学者认为,福利国家是现代化的产物,也有学者指出,福利国家的建立取决于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还有的强调,福利国家是国家自主性和能力的体现,不一而足。上述理论在问世之际,都被视为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但在经验上,另类的福利国家不断出现,接二连三地证伪了此前的理论,并引导出新的解释。可见,诸如福利国家因何产生这样的问题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因为这类社会现象在某一个阶段的起因与后一个阶段是很不一样的。

布莱斯的结论是,政治世界的常态不是可预测性强的第一世界,而是不确定性很高的第二世界。由于我们无法直接捕捉很多位于正态分布以外的变量,因此预测纪录很不尽人意。人类政治生活中的许多重大事件,例如金融危机、出人意料的选举结果、战争的爆发等等,都属于第二世界。第三个世界的事件完全不可预测。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对过去知道得越多,对未来的预测就错得越离谱。这是人的理性思维很难适应的世界。在这里,政治就是一连串无意义的事件,没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可以捕捉,即使侥幸捕捉到了也没有用。幸运的是,第三世界虽然存在,但却是整个政治世界中相对较小的一部分。

如果不考虑预测方法,在第一和第二世界,成功预测与信息获取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线性关系。不过,信息不是成功预测的充分条件,因为即使有足够的信息,预测方法的选择也会显著地影响预测结果。但是,信息却是成功预测的必要条件。由于这个原因,有些问题的预测天然地比另一些问题容易成功。比如,关于“是否”的问题,任何人都有50%的成功概率。但如果要求预测精确到时间、地点、方式、规模等,那么预测的难度就会成倍增加。后一类预测对信息量的要求要高得多。预测要求越精确,需要的信息就越多,预测的难度也就越大,预测成功的可能性相应地就越低。例如,对于“美国是否会衰落”这个问题,几乎没有人会给出否定的回答。它与“美国何时会衰落”或“什么事件会导致美国决定性地衰落”这样的预测问题不是一个难度级别。如果要求预测具体到某年某月,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任新民对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预测纪录做了很有启发性的分类。他注意到,CIA对政治主体主导型政治事件预测的能力较强(例如越南战争的结局),但对非政治主体主导型政治事件的预测纪录很差(例如伊朗伊斯兰革命)。制度对于政治事件有强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在短期内是强大的恒量(constant)。^①要获取关于政府的信息相对容易,但要追踪非政府行为体的动向,难度就大多了,这就严重地影响了预测效果。CIA预测纪录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善于短期预测,拙于长期预测。这也是社会科学预测普遍面临的问题。长期预测之所以难以成功,是因为从预测时间到事件发生时间之间的间隔越长,介入变量就越多,结果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就越大。阎学通的一系列成功预测印证了上述观点:^②第一,他的预测几乎都是政治主体主导型的事件;第二,这些事件几乎都是“双边”事件。由于只涉及双边关系,信息的获取相对容易。

① 任新民:“CIA 政治预测得失的组织原因分析”,第68-72页。

② 阎学通、陆昕:“阎学通:执著于科学预测的现实主义者”,第59页。

如果加入第三方或第四方,预测变量会成倍地增加,计算量也会呈几何级数扩大;第三,双边的一边通常是中国。作为中国学者,对中国的背景知识是外国学者难以望其项背的,对中国信息的获取渠道也要宽广得多。

第二和第三世界的特点之一是社会事件的决定因素中几乎没有恒量。换言之,就是这两个世界的事件制度化水平低,几乎所有因变量都在变化。对这样的世界做预测,最适合的工具是动态数学模型(dynamic models)。然而,动态模型具有内生的局限性。早在1899年,彭加勒(Jules Poincare)就证明了我们无法推导出可以预测一个包含三个或更多变量的动态模型,对这个系统的任何数字近似(approximation)都会极快地失去准确性。也就是说,关于社会现象的绝大部分方程是没有数学解的。既然没有数学解,也就谈不上成功预测。这就从技术的角度印证了布莱斯关于第二世界大部分事件和第三世界事件不可预测的观点。

因此,国际关系预测成功的概率,从根本上取决于所预测的事件处在哪个政治世界。第三世界的事件是不可预测的,第二世界的绝大部分事件也是不可预测的,只有第一世界的事件和第二世界很小部分的事件有可能预测到。但在实践中,对于第二、三世界的预测偶尔也有成功的例子。有趣的是,这样的成功预测者往往不是专家学者,而是整天追踪研究对象的人。原因在于:只有这样的人,才可能获得尽可能多和新的信息,培养出超乎寻常的直觉,而直觉是非科学甚至反科学的。米塞斯在谈到经济预测时说:“真正具有预测能力不是掌握了精深社会科学知识的经济学家,而是在市场上摸爬滚打的商人。与许多经济学家的自嘲相反,他们对商人提供不了什么帮助,也无法预测消费者需求、未来的成本以及经营成本。只有商人才有这种能力,只有企业家才有卓越的预见能力。”^①

但是,如果政治学家或经济学家偶然预测到了具有很高的不可预测性的事件,是否证明了只要改进方法,人的世界一切皆可预测呢?答案是否定的。以经济学为例。经济学是所谓的“社会科学之王”,但是经济学家对真实世界的重大预测几乎从来没有成功过。至于西方经济学家指点转型国家,导致这些国家经济崩溃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但是,整个社会仍然争相购买经济学家的预测成果,并为此付出了极为高昂的成本。薛兆丰认为,这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有两个起因:第一,经济学家的预测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错误的,但总有对的时候。黑暗中的一点光明,尤其引人注目,点燃人们无穷

^① [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经济学的最后基础》,第311-312页。

的期待;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社会迫切需要经济学家的预测服务。^①按照以上的分析,对经济预测服务的需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反科学的。这些反科学的需求又反过来刺激了经济学在反科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相对于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的预测难度更大。国际关系的制度化水平远远低于国内政治尤其是成熟民主国家的政治。在经济生活中可以观察和度量的变量远比在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多,而且信息的获取也相对容易。比如,为了判断某种商品价格在未来一定时期的变动,可以很容易地采访到商品的生产者、经销者和顾客,由此获得一手的资料。类似地,如果我们要预测两个国家是否开战,最可靠的办法是深入两个国家的最高机构调查追踪,但这在实践中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学者们通常只能依赖这两个国家的二手信息,比如领导人讲话、军队调动情况、周边国家和大国的态度、经济状况等等。二手信息有很多的局限性,其中之一是信息未必真实。在政治世界中,故意释放假信息以求在博弈中获得更多的收益是很常见的现象,这就是所谓“不对称信息”(asymmetric information)。^②

四 科学预测的代价

国际关系预测总体上不仅成功率很低,而且代价昂贵。在当代社会科学史上,弗里德曼可能是推崇科学预测的始作俑者。^③他提出,好的理论必须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可以演绎出能够被证实的假说;二是用最少的内容解释最多的现象。实际上,这两个要求是相互矛盾的。理论是由自变量和因变量构成的简单逻辑体系,是信息节约的工具。^④按照弗氏的第二个标准,理论应该越简约越好,最好只有一个自变量,而且这个自变量的外延要尽可能大。唯其如此,才能保证理论能够解释尽可能多的现象。反过来说,一个理论内涵越丰富,解释力就越小。^⑤

然而,要满足弗氏的第一个要求,必须尽可能提高预测的准确性。这与理论的简约性恰恰背道而驰。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结构现实主义以国际权力结构或军事

① 薛兆丰:“如何看中外经济学家”,2005年,http://biz.163.com/06/0329/17/2DD962B700021RKU.html,2014年3月1日访问。

② See James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3, 1995, pp. 379-414.

③ Milton Friedman, “Positiv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pp. 3-43.

④ 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118页。

⑤ [美]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红华译,北京: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力量在大国间的分布为自变量,以大国尤其是美苏关系为因变量。这个理论以其简约性和清晰性成为国际关系科学理论的典范。然而,结构现实主义未能预测到两极格局的和平终结。预测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理论简约的形式美的过度追求。结构现实主义只有一个自变量。可以设想,如果再添加几个自变量,例如经济开放程度、美苏经济和军事力量对比、美苏冲突历史、苏东关系、中苏关系、苏联官僚政治、苏联领导人个性、苏联社会文化变迁、苏联社会运动等等,新模型对冷战终结的预测能力就会得到很大的增强。

但是,成功预测的代价是昂贵的:第一,牺牲理论的简约性,导致模型的内涵过于丰富,结果是让理论本身失去作为知识的价值;第二,可能牺牲理论本身。例如,当在结构现实主义中添加了经济相互依存和领导层观念变迁这样的变量时,就破坏了结构现实主义的国家理性偏好不变以及国家追求相对收益等假定,从而瓦解了结构现实主义本身;第三,即使预测正确,我们也无法验证是哪个具体的因变量显著地导致了所期望的结果。对于苏联因何解体,国内外学术界已经争论了二十多年,但是,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性地导致了前苏联领导人放弃联盟,迄今没有定论,而且可能永远也不会有定论。

第三个代价不仅是由预测本身造成的,也根源于社会现象的一个特性,即无法做可控实验。弗里德曼承认,社会科学预测最大的障碍是无法做实验。在自然科学中,通过实验,我们可以消除最重要的干扰因素。但在社会科学中,我们不得不依赖“偶然发生的实际情况所提供的证据来进行检验”。^①正因为如此,研究者无从知道哪些因素对于某种人类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索罗(Robert Solow)坦言,硬科学方法只能处理复杂的自然系统,比如氧原子或视神经,原因是这些系统能够被隔离试验,能够在可控制的条件下反复观察。另外一些科学,比如天文学,成功的关键是他们能够在自然但基本静止的条件下做长时段观察,而研究对象不会被噪音淹没。社会系统未必比这些自然系统简单。但如果既无法做可控实验,又无法使研究基本静止,要预测是相当困难的。^②

第四个代价是我们甚至不能分辨是理论还是人的非理性直觉正确预测了结果。有学者坦言,国际关系预测是一个“刺激”的过程,是一种“享受”,“有点像玩股票”。^③

① Milton Friedman, “Positiv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pp. 3-43.

② Robert Solow, “Economic History and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5, No. 2, 1985, pp. 328-331.

③ 阎学通、陆昕:“阎学通:执著于科学预测的现实主义者”,第59页。

如果预测真是科学的,应该不至于出现这种状况。青泽在论及股票期货投机时深刻地指出,准确地预测市场是“一件非常困难、甚至说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在充满不确定性和随机性的市场上,市场上的投机者都会运用某种投资理论的支持。尽管如此,很难验证这些理论是否真的有效。理论的主要作用并不是指导投资,而是帮助投资者克服恐惧感,是“某种权威、某种依靠、某种保障”。至于这个权威、依靠或保障是否可靠,反而是次要的问题。^①如前所述,投机市场属于高度不确定性的第二世界。如果对投机市场的预测主要依赖于直觉和信仰,那么,对处于同一世界的政治现象的预测,情况也是如此。这样的话,不仅预测本身不是科学预测,而且理论也失去了被科学验证的可能性。

五 何谓国际关系学的科学性?

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促进知识的增长,知识增长体现为理论创新。国际关系事件、时事、数据本身不是知识,只是信息,“民主国家不打仗”、“军事联盟促进经济交流”这样的命题才可能是国际关系知识。

预测代表了一种积极的科学观,其目的是证实。但诚如波普尔所言,理论无法被一劳永逸地证实。我们无从知道,今天被证实的理论,明天是否会被新的事件证明是错的;反之亦然。^②因此,科学的理论一定是可证伪(falsifiable)的。证伪意味着一个理论被推翻,可证伪性意味着一个理论可能会被未来的或未发现的事件所推翻。我们接受一个理论,并不是因为这个理论被证实了,而是因为它还没有被证伪,同时始终存在被新发现的事实推翻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知识,本质上都是“消极的知识”。它只能让研究者排除某些结果,但无法把可能性的范围缩小到只剩一种可能性。^③例如,“冷战和平终结”这个意义深远的历史事件尽管证伪了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这两种解释,但并没有证实主流建构主义的解释。所谓共享文化导致冷战的终结只能作为一种还未被证伪的解释暂时留存下来。

综上所述,国际关系学的科学性不在于理论的可预测性,而在于理论的可证伪性。

① 参见青泽:《十年一梦:一个操盘手的自白》,广州: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

② [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范景中译,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③ [美]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第37-38页;[英]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104-111页。

至于脱离理论的国际关系预测,则不能划入国际关系科学的范畴。人们可以获取或多或少的国际关系信息,所谓科学的方法也不局限于国际关系学,但国际关系学者的贡献就在于提出关于国际关系行为体相互作用的具有可证伪性的理论。

结 论

科学预测假定世界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而这种稳定性和连续性只有自然世界特别是物理世界才具备。因此,科学预测本质上是物理学和工程学的思维。其实即使是最稳定的物理世界,预测有时候也很困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天气预报就经常出错;科学家很难准确地预测地震。归根结底,国际关系是人的世界的一部分。国际关系不是完全不可预测,但总体上可预测性很低。国际关系预测的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事件的性质,即属于布莱斯所说的第一、第二,还是第三世界,而非预测工具的选择。工具是由事件的性质决定的,是第二序列的问题。如果选用的工具违背了事件的性质,其结果将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至于预测精度的提高是否代表了国际关系学的进步,只有在明确了事件的属性之后,才有科学的意义。

尽管预测在国际关系学中很可能是不科学的,但探讨这个问题本身却是国际关系科学发展的需要。它可以衍生出许多有价值的后继问题。例如,具体而言,在国际关系中,哪些事件属于第一世界,哪些属于第二世界,哪些又属于第三世界,这是很需要厘清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成功回答将极大地推动国际关系预测的发展。又比如,政治世界与经济世界的共同之处和区别到底在哪里?国际关系与物理世界的具体区别何在?回答这样的问题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国际关系的特质,理性选择自然科学的量化分析工具进行分析和预测,具有重大的意义。

(作者简介:卢凌宇,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责任编辑:张海洋)